

石头城畔的人类远祖

—— 南京猿人

很久以前 地球上有很多森林 繁茂的大树上生活着许多跟现在人类相像的古猿。后来，由于环境的变化，树木不断减少，他们只得下到地上活动。为了生存，他们逐渐直立行走，使手和脚获得分工，并扩大了视野和活动范围。在与大自然搏斗的过程中，他们必须利用简单的工具并进行协作，这种为求得生存而进行的劳动使他们的脑容量不断扩大。终于，他们用石头制造出了简单的工具，语言也在合作劳动中产生了。从此，地球大家庭诞生了一个新成员——人类。

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根据研究，把从猿到人的进化过程分为猿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三个阶段，其中猿人是人类进化的最早阶段，而现在的人类则处于晚期智人阶段。提起我国发现的猿人化石，大家首先会想到元谋人、蓝田人和北京人。这里要讲述的是不久前在古城南京附近发现的又一猿人化石——南京猿人。

南京猿人发现于南京市江宁县汤山镇雷公山葫芦洞内。汤山镇位于南京市东北，距南京城约 28 千米。附近多为低山丘陵，蜿蜒连绵，因“汤山温泉”等名胜古迹而成为南京市重要的旅游风景区之一。1990 年 3 月，汤山镇采石场在雷公山地段采矿时发现了一个大溶洞，即现在的葫芦洞，洞内堆积了大量的动物化石。1992 年 6 月，江宁县政府决定将此溶洞作为旅游资源进行开发。1993 年 3 月 13 日上午，汤山镇旅游公司的民工在葫芦洞内南侧的一个

小支洞挖土时，发现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古人类头盖骨化石。这一发现引起了当地文物部门的注意。从 1993 年 4 月起 南京市博物馆的考古工作者对洞内挖出的积土进行筛洗和整理，于 4 月 17 日又发现了一具猿人头骨化石，它全部被坚硬的碳酸钙包裹，只露出一小部分额骨。这些发现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1993 年底到 1994 年初，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南京市博物馆和北京大学考古系联合组成考古发掘队，对发现猿人头骨化石的小支洞进行了考古发掘，又获得了一枚猿人牙齿化石及 2000 余件动物化石标本。

对古人类化石的研究，需要有完整的标本和丰富的材料。要进行全面研究，就需将残破的头骨尽可能地拼接、修补和复原，而进行古人类头骨的复原，至少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化石材料必须保存具有主要形态的部分，并且残破得越少越好；二是要拥有同一时代及形态特征相同或相似的比较标本和模型。

在已发现的两具南京猿人头骨化石中，最初发现的一号头骨保存较为完整，有颅骨（包括额骨、顶骨、部分枕骨）和部分面骨（包括完整的左眼眶、眉骨、少许鼻骨和颧骨）。通过对其形态特征的观察发现，它和北京猿人头骨有许多近似的特征，如尺寸大小、额骨低平的程度等。此外，国内已发现的一些古人类头骨化石，如安徽和县人、山东沂源人、辽宁金牛山人和陕西大荔人等，在某些形态特征上和南京猿人一号头骨也相近。因此，一号头骨在复原时以北京人头骨作为对比标本，将上述其他头骨化石作为参考标本。

根据对一号头骨标本及复原模型的研究，其形态特征具有一系列的原始性，如眉脊部分粗壮并向前凸出，顶骨上的矢状嵴（原始人头顶正中一条前后向的突起）发达，额骨低平并向后倾斜，骨壁较厚，脑容量较小等。对这些原始特征的分析表明，该头骨应是年龄在 30 岁左右的女性，其鼻骨、上颌骨、额骨内外构造及脑容量等方面均与北京猿人相似，而颧骨形态更具有包括现代中国人在

内的蒙古人种的共同特征。

在对一号头骨进行形态观察的过程中，研究者发现了一个十分特别的现象。此头骨的额骨表面有大片因骨质病变而引起皱褶骨隆起，这一现象在我国已发现的猿人额骨中属于首见。这与因梅毒伤害额、顶骨骨板的结果在特征上几乎完全相同，但科学家们尚无法肯定其成因。如果能确定一号头骨上的额骨瘤和梅毒病有关，则应是世界上最早的梅毒病例。

南京人二号头骨仅保存额骨部、顶骨及部分枕骨，石化程度比一号头骨重。因此，二号头骨的复原和研究工作较为困难。对头骨残存部分的分析研究表明，其骨壁比一号头骨厚，顶骨上的矢状嵴很发达，初步判断为年龄在 35 岁左右的男性。

经考古发掘所获得的猿人牙齿化石，保存有完整的齿根及牙冠咬嚼面，较纤细，经分析鉴定为右上第三臼齿。化石的特征总体上与北京猿人的臼齿相似。根据牙冠咬嚼面的磨耗程度，并考虑到当时人类食物粗糙，该臼齿可能代表 35 岁左右的个体。南京猿人牙齿化石是目前出土的南京猿人三件化石中唯一经过科学发掘获得的材料，具有明确的地层关系和确切的出土地点。它科学地证明了古人类化石和动物化石的共存关系。

与南京猿人化石一起出土了大量动物化石，经鉴定共包括 15 种古脊椎动物，如鹿、肿骨鹿、牛、犀牛、中国鬣狗、野猪、熊、虎、剑齿象等，以鹿类和牛的数量最多。根据对这些动物化石标本的观察分析，发现其中的典型动物，如棕熊、中国鬣狗、肿骨鹿、梅氏犀等，均是华北地区中更新世北京人动物群的主要成员，而且它们在数量上占了绝大多数。由于这些动物只在几十万年前的中更新世才有生存，具有较强的阶段性，因此，南京猿人动物群的地质年代应为中更新世。但动物化石中也包含有剑齿象等南方动物群中的种类，说明当时南京汤山一带的气候较北京周口店一带更温暖湿润，应属亚热带气候。

在出土的大量动物骨骼和碎片中，经观察发现相当数量的残骨上有食肉类动物啃咬的痕迹。因此，导致当时许多动物死亡的原因很可能是食肉类动物捕杀所致。但动物群葛氏斑鹿和肿骨鹿的死亡年龄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这两类动物被食肉类动物捕杀的年龄大多应为幼年，而南京人动物群中这两类动物的死亡年龄以成年为主。因此，当时鹿类除了被食肉动物捕杀外，人类也很可能参与了狩猎。

用科学手段进行年代测定的结果显示，南京人化石的年代距今约 35 万年。结合对猿人化石形态特征及其伴生动物化石的研究，南京猿人应生活在距今 35 万年前的中更新世时期，属人类体质发展史上的猿人阶段。

南京猿人化石的发现，为国际学术界关注的地球上人类起源于何时何地的问题提供了珍贵的材料。有人以非洲发现了多处距今几百万年的古人类化石，提出人类起源于非洲的观点。事实上，我国发现的古人类化石也很丰富，最早为距今 170 万年的元谋人。南京猿人和北京人一样，在形态特征上显示出许多蒙古人种的性状。我国发现的古人类化石，早自元谋人，晚至山顶洞人，其蒙古人种特征始终存在，说明蒙古人种的主要性状出现早，在中国广阔的土地上一脉相承地发展至今。因此，人类应是在不同的地区各自适应环境而发展进化来的。

值得注意的是，南京人化石地点至今尚未发现古人类的生活场所及遗留下来的遗物，如用火的遗迹和石器、骨器等生产、生活工具。根据人类演化阶段的生产力水平，这一时期的人类已掌握了取火、制造生产工具的技能，而在出土南京人化石的葫芦洞小支洞内却没有发现。这一现象引发了人们一系列的思考，如猿人及大量的动物化石是如何进入洞穴的？当时人类是如何生存的？等等。我们相信，随着以后进一步的考古发掘和研究，这些问题都将会得到圆满的答案。

遥望人类的童年

—— 阴山岩画艺术

“敕勒川 阴山下……风吹草低见牛羊。”当人们吟唱起这首著名的鲜卑族民歌时，眼前总会不由地浮现出一片壮丽秀美的北国风光，还有那壮士纵马奔驰的豪迈身影。然而，你是否知道，正是在这绵延千里的阴山上，远古的牧人刻下了他们一代代生活的足印，默默穿越了千百年，无声地诉说着这片群山峻野中发生的一切——这便是阴山岩画——20 世纪 70 年代才为人所知的一条“千年画廊”。

1976 年 8 月，几位考古学家又一次前往内蒙古地区调查汉长城。经过阴山山脉中一个不起眼的小山头时，听当地牧民提起，山下岩壁上有人面形象的画面，他们立即赶赴现场。这便是阴山狼山地区发现的第一幅岩画。随后的 5 年时间里，研究者们走遍了这里的大小山岭，终于使这受风吹雨淋近万年的阴山岩画渐渐成为众所周知的古代艺术杰作。

阴山山脉绵延千里 到目前为止 仅仅是对其中的狼山地区作了系统的调查和记录，就已经获得了大量珍贵资料。研究表明，这些岩画最早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一直延续至今，始终是人们或多或少记录下生活片段的一种方式。岩画数量多得惊人，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以狩猎、放牧和祭祀活动的生活画面居多，为研究北方各历史时期的经济活动、宗教信仰及生态环境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在狼山地区 考古学家们探查到了 1 万多幅岩画。尽管如此，这些远古时代的艺术品却并非如想像中那样“陈列”在漫山遍野。通过数年来艰苦的野外工作，人们总算找到了一些岩画的分布规律，才使得这些绝妙的艺术精品再现于世人面前。

首先，岩画的创作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阴山岩画一般都作于坚硬而又平滑的石面上，仅有少数是磨刻在花岗岩石上的。同时，岩画都分布在避风向阳的地方，画面向东或向南，周围往往都是山水奇秀之处，不仅奇石林立，还有溪水畅流。

其次，岩画的分布地点与画面所描绘的题材内容有关。山巅处的岩画内容一般是各类野生动物，也许是因为野性经常在那些地方奔驰。有众人舞蹈场面的岩画则常常凿刻在沟畔立崖上，可能当时的娱神活动就在那些地方进行。另一类发现较多的是人面形的图案，研究者认为，这是天神的形象，而这类岩画几乎都分布在深幽的山谷崖边。那里山高谷深，每到夏季便山洪暴发，水声震天，古人大概由此而认为那里是神仙所居之处。

比较晚期的岩画作品分布，就和北方游牧民族历史上的活动情况密切相关。比如，磴口县北部，曾是西夏王朝的管辖地区，那里就发现了西夏党项族人所作的动物画，上面还留下了西夏文字。又如五原县以北的狼山之中，曾是匈奴人的发祥地，那里就发现了相当数量的匈奴人岩画。

总之 在了解岩画分布的地域特点之后 再结合岩画内容来理解古代的社会生活，使我们能更真实地贴近过去。

阴山岩画像是一把多面的镜子，可以从中折射出古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反映最多的是古代人们的经济生活。由阴山岩画看，原始山民很早就发展起了狩猎业，并一直延续到近代。仔细分析还可以发现，不同时期的行猎方式有所不同。有的是人多势众的围猎场面，有的是配合默契的双人合猎，还有孤胆英雄式的单人行猎。其

中表现最多的还要数单人行猎，也许这是因为人们佩服并欣赏狩猎能手，所以较多的描绘了这些英雄，也可能古代北方的猎人就是这样喜欢独来独往吧。

另一项重要的经济活动是畜牧业，这在阴山岩画里也表现得丰富多彩。岩画中有许多牧羊场面，放牧形式多种多样，为了解当时的放牧技术提供了很好的依据。在今天内蒙古的草原上，我们甚至还能依稀看到过去放牧方法的一些影响呢。

经济生活之外，猎人和牧人的生活习俗也能从岩画中略知一

首先 当时普遍存在着祈祷的习俗 凡是与人们生活休戚相关的大事，大约都要先进行一番祈祷。从岩画上看，祈祷的方法一般都是人的两腿分开 两臂伸平 自肘部折而朝上 手指分开 显得分外毕恭毕敬，庄重肃穆。祈祷的对象是人们所崇拜的动物和神灵，祈祷的目的是乞求保佑和预祝出征或狩猎成功。

从这些岩画中，还可以看到有关杀人祭祀的场面。比如有一处画面，舞者跳着粗犷狂热的舞蹈，祭场上陈放着血淋淋的尸体，人头和无头无腿的尸体弃置于地。站在这样的画面前，你仿佛就能听到耳边隐隐传来舞步声和击鼓声，而这种杀人祭神的习俗，在世界范围内都曾经广泛流行。

还有许多细节反映了牧人、猎人的日常生活。比如他们的衣着服饰，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发型和服装。又比如他们的居住方式，早期岩画中人们站在类似洞口的地方，晚期岩画里人们就有帐篷住了。还比如他们的娱乐活动 有赛马、斗骆驼、鹿棋 很像今天的走兽棋 内容非常丰富。

正是这些画面 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背景材料 从而才能重建一个生动真实的古代社会。

古人的精神世界一直是世人好奇又难以了解的。从阴山岩画中，我们至少能对当地先民的原始信仰、崇拜对象有一定的认识。

动物崇拜是最普遍的崇拜方式，岩画中的动物崇拜，往往对动物的特性和作用表现得十分夸大，比如把动物画得很大，人画得很小；也有的将不同动物的特征拼凑在一起组成新的形象（这就和“龙”的形象有异曲同工之妙了）。对天体的崇拜在阴山岩画中也较多见，一般表现为膜拜天体的画面，其中对太阳的崇拜远在其他天体之上。还有一些画面表现的是对人形神的崇拜、对各种印迹（手印、足印、蹄印、爪印等）的崇拜和某一特殊图腾的崇拜。

岩画的发现对研究当时的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比如对古代舞蹈场面的大量描绘，反映了古人精湛的舞蹈艺术；一些原始符号的运用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古人的记数方法和科学常识……这样的例子，在阴山岩画中是数不胜数的。

迄今为止，国际上还没有一种公认的科学手段可以用来解决岩画的断代问题。人们还是要依靠考古学的传统研究方法来推测岩画所属的年代。阴山岩画是一处绵延千里的露天画廊，全部作品都裸露于石面上，没有任何有助于判断其年代的直接证据。因此，要区别不同时期的岩画作品，并且推测出各自创作的大致时间，就只能从岩画本身去寻找线索。考古学家们一方面从世界各地研究岩画时代的不同方法中挑选一些适宜可行的手段，一方面又充分利用阴山岩画自身的特点和中国特有的文献优势，基本上解决了阴山岩画的年代划分和确定问题。

为了保证在阴山岩画断代上获得相对的准确性，考古学家主要从这样几个方面进行了分析。首先是岩画的题材。这是判断年代的一个重要依据。因为作画者所处的社会和自然环境会在他的作品中得到如实反映，不同时代由于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的差异，与人共存的动植物类别就会有相应的差异，而不同时代宗教信仰的差异，也会使反映精神世界的画面表现手法和内容有所不同。比如，阴山岩画中有大量野生动物的题材，动物学家的研究表明，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就已灭绝的动物种类，如

打角鹿、鸵鸟等，据此我们可以确定，这些岩画必然创作于旧石器时代。因为这之后的人们是不可能看到、也无法描绘出这些动物的形象的。

另一个判断的主要依据是岩画制作的方法，往往因时代不同而相异。阴山岩画早期的制作方法是磨制，先大致凿出一个轮廓，然后用专门的石头，蘸上细沙磨出图案。稍后开始使用敲凿法，这种方法延续的时间较长，贯穿阴山岩画艺术的各个时期。到了文明时代，由于工具的改进，出现了线刻画，即用金属工具的锐锋用力划刻而成，这是未使用金属工具的史前时代不可能运用的作画方法。另外，早期岩画敲凿的点小而密，不显敲凿痕迹，越到晚期，凿刻的点就越大，制作也显得粗糙。

另外，观察岩画的叠压情况，也是判断岩画年代的依据之一。在一幅画面上，常常有晚期作品刻画并覆盖于早期作品之上，考古学称之为“打破”关系。据此可以判定画面的相对早晚，继而观察两者间的先后差异。还有运用比较学的方法，将阴山岩画和邻近地区已知年代的其他岩画作比较，或者将岩画图案与当地不同时期文化遗物上的纹样作比较（如十分具有北方特点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上的动物纹饰），根据其相似程度，也能大致判断岩画的年代。另外可以充分利用岩画上出现的题字，在晚期阴山岩画中，出现过回鹘文、西夏文、蒙文和满文等，都是断定岩画年代的重要标志。其他如古文献记载、岩画的保存情况等，在具体的研究中都有很重要的作用。

通过对阴山岩画所作的详尽分析，考古学家们认为，最早的岩画大致在新石器时代早期或更早一些就已出现，从那时起，岩画创作一直延续至今。如果要作细致划分的话，阴山岩画艺术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三个阶段。

第一是石器时代。相距今天约 1 万 ~ 3000 年时间，甚至还要早一点。有的专家称这一时期是阴山地区的“狩猎时期”，因为当

时的人们以狩猎和采集为生，岩画内容也以动物和狩猎的场面居多。还有一些原始舞蹈、祭祀、祈祷的场面和一些大幅人面（神面）像。这一阶段延续的时间最长，根据不同种类动物群落出现的年代早晚，还可以划分更细的段落。

第二是青铜时代，包括早期铁器时代。时间上距今约 3000 年开始，一直到公元初的几个世纪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的夏商周至秦汉时期。随着青铜工具的使用，北方经济也相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阴山地区的畜牧业就出现在这一阶段。由岩画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大规模放牧或部落间征战的画面，还有很多驯化动物的形象。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内北方匈奴民族的岩画在整个阴山岩画中分布非常广泛，主要以动物形象为主。这类岩画的艺术特征十分突出并且在整个亚洲草原广泛流行，被国外的研究者称为“匈奴风格”。

第三是历史时期。时间约为公元 6~19 世纪相当于北朝到清代。由于地理环境的特点，这一时期阴山地区仍以畜牧业为主。生活在内蒙古草原上的各游牧民族在这一阶段相继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并题刻在岩画作品中。通过辨认可以知道这其中由早到晚主要有突厥人岩画、回鹘人岩画、党项人题刻西夏文的岩画和蒙古人有关喇嘛教的岩画。在这一阶段，尤其是宋元以后至明清时期，原先代替文字记录社会生活的岩画艺术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开始逐渐走向衰落。

阴山岩画产生于遥远的古代，这个跨越几千年的艺术画廊为人们了解北方少数民族的历史、社会生活和经济文化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它犹如一个穿越时空的窗口，从中可以看到那属于古代北方猎人、牧民的广阔天地。

阴山岩画的大部分作品创作于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反映了原始部落历史生活的各个方面。余下的少数岩画是历史上有所记载的各少数民族的作品，而正是这一小部分岩画对探寻曾在阴

山地带活动过的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阴山山脉和整个辽阔的内蒙古大草原，是我国古代北方民族匈奴人起源的地方，他们在这里度过了这个民族的襁褓岁月和青春时代，匈奴及其先人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凿刻下了大批的岩画，在所有游牧民族岩画中居于首要地位，不仅分布广、时代早、数量多并且艺术价值也很高。

阴山岩画为研究匈奴文化提供了丰富而可靠的资料。比如，关于匈奴人究竟有没有文字的问题，有人曾根据《三国志》说扶南“亦有书记府库，文字有类于胡”的记载，一口咬定匈奴有文字。但是，根据阴山岩画、内蒙古草原岩画以及蒙古岩画中均未发现匈奴文字的事实，似可证实匈奴民族并没有自己的文字。又比如，阴山岩画也证实了匈奴人的宗教及其表现形式同中原汉民族的文献记载是相符的，《汉书》中曾说匈奴人崇拜的对象是宇宙，而拟人化的宇宙神形象在阴山岩画中就有生动的表现。

匈奴之后，可以确定族属的是突厥岩画。据记载，隋唐时期阴山地区和以南的鄂尔多斯高原是突厥人比较集中的地方，因此，在这一带有突厥民族留下的岩画、石人像等历史文物。突厥岩画的显著特征是动物形象的简略化、图案化和符号化，善于用抽象和象征手法表现事物。在岩画中，还多次出现规范化的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古文字专家认为，这些符号与突厥字母十分相似，说明突厥文可能起源于突厥岩画。

继突厥人后，在这一地区居住的是回鹘人和粟特人。根据他们留下的岩画和岩画上的文字，可以看到当时与中亚、西亚交流的一些片段。

从唐末开始一直到元初，这里始终是党项人活动的地方。党项人的首领李元昊建立西夏国，统治这一地区达很长时期。但奇怪的是，这里发现的有西夏文的岩画却只有一处，相对于当地发现的大量西夏古建筑和西夏人的墓葬，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谜。

蒙古族紧随其后来到这里游牧。他们作画的方法和以前以凿刻为主的形式有很大不同，主要是用毛笔蘸上石灰拌素油制成的浆汁画在石面上。内容方面也增加了大量反映宗教活动的图案和法器，显示了喇嘛教与蒙古民族生活的密切关系。

总之，各个时代、各个民族的岩画如一条环环相扣的历史长链，对于研究民族史的专家来说是十分珍贵的材料，对于一般的欣赏者来说 又是一卷连续而又精彩的图说“北方通史”。

阴山岩画的发现不过是近几十年的事，但它从产生至今却已走过了近万年的风风雨雨。写实、夸张、传神是阴山岩画最突出的三个特点，在这里，写实和夸张不是相互矛盾而是互为补充。正是通过写实又夸张的艺术手法，古代先民为我们留下了传神的历史记录，它就像是一本生动的大百科全书，关于北方古代文明的种种探索，都能在其中找到答案。

有人说 岩画把我们带回到人类的童年时代。的确 岩画作品丰富的内容、粗犷的手法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幅古代先民生活的历史画卷，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类从蒙昧到文明的历史轨迹。那自然又不加修饰的刻画，犹如出自儿童手中的笔，描绘了人类童年时代眼中的世界。这个世界和今天一样的丰富多彩，一样的令人神往。

中华文明的曙光

—— 红山文化“女神庙”

在中国北方地区几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古文化中，红山文化近年来名声大噪，引起了考古界、文物界、美术界人士的极大兴趣。为什么呢？因为在这类古文化遗址中出土了轰动性的精品，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彩绘泥塑女神像。让我们先从稍远些的地方说起，再慢慢贴近这尊女神。

红山文化是由于最初（1935年）在赤峰红山后遗址发掘出古物而得名（定名于1954年），它的主要器物是彩陶、“之”字形纹陶、细石器和一种特有的挖掘工具，实在是貌不惊人。它的遗址主要分布在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河北北部，范围不算很广。经碳14测定出的一个数据是公元前3500年，距今约有5500年了。红山文化在发现、定名之后的几十年时间里，基本上没有什么更新的东西出土，当然也没有引起什么特别的关注。在1986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的“红山文化”条目也比较简单，最后说：“红山文化经历了相当长的发展过程，它的分期和发展阶段也是今后有待解决的研究课题。”

事实上，进入80年代以后，红山文化遗址中已开始有了突破性的重大发现，只是由于出版周期等原因，还没能在百科全书中反映出来。在1993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中已有“牛河梁遗址”条目，对红山文化的这一重要遗址作了较详细的介绍。

在辽宁省西部凌源、建平两县交界的一个山谷间，有一处叫牛河梁的山梁。1981年文物普查时在这里发现了一座石棺墓，出土了一些玉环等古人用过的装饰品。1983年经过试掘，又发现了“积石冢”和“女神庙”。由此开始，红山文化中这一重要遗址里的宝物渐渐“露白”，并为世人注目。

所谓“女神庙”位于牛河梁山顶南侧的坡地上。1983年10月的一天，考古学家们正在附近一带山沟里东寻西找，猛然发现了沟中散布着的红烧土和泥塑人像的肢体残块。他们循迹探查，在揭去一处坡地上的一层表土后，庙址的范围就基本显露出来了。这“女神庙”的名字是后来起的，因为那些残肢什么的最后拼接成一些人体，经研究，身份属于神人，而又是女性特征，自然是女神了。而“庙”的判定很简单，这里有两组半地穴式的建筑（只是地面部分已经塌陷了），联系到里面供奉的神像和建筑特点，考古学家因此判断，这里在当初是个祭神的场所。

由于庙址建筑已经倒塌，所以里面的神像、动物塑像，当然也是被当作神明供奉的，已被压碎、断胳膊、断腿，埋在穴里，实在是“不恭敬”得很。泥塑的人像全是女性（有乳房造型碎块），而且与真人大小类似（个别的为真人的二至三倍），以拼装结果估计，这些头、耳、手、上臂、乳房等大致属于六至七个“女神”。其中最吸引人的是一件较完整的“女神”头像，只见她双目炯炯有神，眼珠中嵌有玉片，嘴角上翘，两颊鼓起，尽管属于她的肢体已难拼接，但从其面部神情也可约略窥见“女神”当年的神韵与风采。现在任何一部讲中国古代雕塑史的著作，几乎都要提到她，有的专家甚至惊呼：“女神”改写了中国美术史！

翻开中国原始美术史，只见到一些零星出土的人面塑像，其中也有一些比较精彩的。比如陕西扶风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过一口瓮，瓮口沿下堆塑出一张“苦恼人的笑”的脸，八字眼，直鼻梁，嘴角上翘，堪称传神之作。1982年，在辽宁喀左东山嘴红山文化遗址

中曾出土过裸体女性雕塑像(头部未存)皆泥质红陶胎,可能是生育神的形象。但这些人面、人体雕塑,都没有牛河梁“女神”精彩,加之该遗址还有其他珍贵文物出土,所以说牛河梁文物的出土,给远古文明史的研究带来了新的曙光。

黄河下游的远古居民

——大汶口文化寻踪

大汶口文化是我国黄河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 1959 年发掘的山东省泰安市大汶口遗址而得名。主要分布在山东省泰山周围地区 东达黄海之滨 北抵渤海南岸 西到鲁西平原东部 南及江苏省淮北一带，安徽和河南省也有零星发现。据测定，其年代约始自公元前 4300 年 到公元前 2500 年前后发展为山东龙山文化。目前已发现的大汶口文化遗址计 200 多处。

大汶口文化是以夹砂红陶和泥质红陶为主要特征的，也有灰陶、黑陶、彩陶，并有少量硬质白陶。泥质陶器上常饰镂孔、划纹，有彩陶和简单的朱绘陶。砂质陶器上少数饰堆纹或篮纹。三足器、圈足器发达，也有平底器、圜底器和袋足器。典型器物为觚形器、釜形鼎、钵形鼎、罐形鼎、镂孔圈足豆、双鼻壶、背壶、宽肩壶、高柄杯、瓶和大口尊等。先民盛行枕骨人工变形和青春期拔齿的习俗（一般拔除一对上颌侧门齿）是大汶口文化所独有的奇特习俗。此外，死者随葬獠牙、獠牙钩形器及龟甲等，也为其他新石器时代文化所罕见。

大汶口文化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早期约为公元前 4300 ~ 前 3500 年间。以王因、刘林遗址为代表。红陶占绝大多数。典型器物有觚形器、釜形鼎、钵形鼎、彩陶盆、钵等。中期约为公元前 3500 ~ 前 2800 年间。以大汶口墓地早、中期墓为代表。典型器物有折腹罐形鼎、实足鬶、大镂孔圈足豆、深腹背壶等。晚期约为公

元前 2800~ 前 2500 年间。以大汶口晚期墓为代表。灰黑陶、黄陶剧增。典型器物有篮纹鼎、袋足鬶、折腹豆、瓶、磨光黑陶高柄杯、篮纹大口尊等。

大汶口文化的社会经济是以农业为主，主要是种粟。在三里河遗址的一个窖穴中，出土了约 1 立方米的朽粟，说明当时粮食已有了相当的剩余。农具以石器为主。早期除使用一些磨制粗糙的石铲、石斧外，大量使用磨制精致的穿孔斧、刀、铲、镞、凿等石器，还有骨镰、蚌镰以及加工谷物的石杵和石磨棒。中、晚期出现了有肩石铲、大型有段石镞、石镐头和鹿角锄。从早期起，家畜饲养就较发达，遗址里发现了不少猪、狗、牛、鸡等家畜家禽的骨骼，还有用狗或猪随葬的。中期以后，以猪随葬开始盛行。大汶口 133 座墓中用猪随葬的约占三分之一以上；三里河墓地的一座墓中，随葬猪下颚骨多达 32 个。这表明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对猪的饲养已十分发达。渔猎在社会经济中也占有一定地位。渔猎工具有尾部带孔的双倒刺或三倒刺骨制鱼镖、鱼钩以及各式骨镞、角镞、牙镞和石质、骨质的匕首，还有石矛、骨矛等大型投刺猎具和较多的网坠。遗址中还发现有獐、斑鹿、麋鹿和狸等的残骨。这些野生动物当是狩猎的对象。

与渔猎经济发达相联系的是大汶口文化的制骨工艺相当发达。如大汶口文化所特有的獐牙钩形器，器柄往往刻有纤细的花纹。早期已有了小型精致的手工艺品，如大墩子墓地发现的一串十粒骨珠都经钻孔，雕刻着图案。

陶器生产的发展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早期均手制，绝大多数为红陶，器类少，器型也简单，火候不高。中期灰、黑陶比例有所增加，出现了薄胎、质地细腻的灰白陶，器类增多，器型也富有变化创新，出现了动物形象的陶容器。大墩子墓地的一座墓中，随葬有五块绘制彩陶的颜料石，说明当时已存在着专门从事制陶的手工业者。晚期阶段，制陶业有了更为显著的进步，已使用轮制技术生